

李觏非孟思想探析

陆 畅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孟子思想的宋代复兴也伴随着批评的声音。李觏是宋代非孟思潮的先驱,他从历史观念、孔孟关系以及人性论等方面批评孟子,对宋代孟子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李觏;尊孔抑孟;王霸之辨;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 B244.1;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3-0093-06

Analysis of Li Gou's Criticism on Mencius

LU Ch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Mencius revived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criticism. Li Gou is the pioneer of criticizing Mencius in the Song dynasty. He criticized Mencius from such aspects as history concepts, connection betwee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hich played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ncius thoughts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Li Gou; respect Confucius while belittle Mencius; debate between Wang and Ba; theory of human nature

孟子及其学说的地位在宋代逐步升格。一方面,孟子接续孔子之道的“道统说”渐渐成为宋儒接受的主流观点;另一方面,孟子的“以意逆志”的解经方式也在宋儒思想潮流中蔚然成风,《孟子》的地位也渐有超越《六经》之势。在这样一股时代性思潮中,李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孟子学说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审慎的批判。本文将探析李觏非孟思想的主要观点,以认识孟子思想效应在宋代展现的另一面相。

李觏,字泰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出身寒微,自称“南城小民”。屡试不第后,创建“盱

江书院”,一生以教学为务。李觏崇尚功利,提倡“经世致用”,重视礼学名教。他反对宋代普遍推崇的孟子学说,著有《常语》以驳孟子思想,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先驱者。

孟子思想在宋代成为显学,不仅“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对其推崇备至,在其后的张载、二程那里更是受到尊崇,并将《孟子》与《论语》并列,从而形成了“四书”的雏形。同时,孟子的地位也由“诸子”一跃成为仅次于孔子、颜回的圣人,汉唐以来“周孔”并尊的格局也为“孔孟”之道所取代。宋代的尊孟思潮所来由渐,并非偶然。从历史层面看,唐宋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变革,这不仅体现在社会阶层由门阀士族变为寒门出将相,也表现社

收稿日期: 2013-10-19

作者简介: 陆 畅(1986-),男,江苏宿迁人,南京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儒学及三教关系研究。

会思潮由汉唐注重事功礼教等外王之学转向内圣之学,汉代的经学转变为注重形而上之道的理学。而李觏正处于这个转向逐渐形成的初期,他对孟子学说的批判也就涵括了从外王的仁政、礼教到内圣的人性论等各个方面。

李觏首先从《孟子》中相关历史记载和评价入手,对孟子的历史描述提出置疑。他认为孟子所言多是富于道德理想性,而忽视其中的历史真实性。

《孟子·公孙丑上》有言: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李觏指出:

《大雅》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玉瓚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得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承之,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哉!^{[1]515}

李觏认为孟子所说的“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而王天下之说与史实不合。据《大雅》记载,周在王季之时就已经中分天下而治,拥有当时天下一半的国土了,何止百里?而根据《商颂》记载,商自相土为王时,就已经威加海内、八方率服了,国土又何止七十里?因此孟子所言有失,会误导别人。

如果说,上面对孟子的批评有史实根据并言之成理,那么下面则表现出李觏在历史观念上与孟子不同的认识。

《孟子·万章上》有言:

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

李觏指出:

或问:伊尹废太甲,有诸?曰:是何言欤?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成汤既没,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微之之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归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1]346}

李觏认为孟子所说的“伊尹废太甲”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李觏认为君是至高无上的,怎么可能被废呢。从时间上看,所谓流放的“三年”,其实是太甲为他的父亲成汤丁忧的时间;从地点上看,太甲不是被“流放”到桐这个地方的,而是为了便于守孝主动“宫于桐”的。守孝毕,伊尹便奉太甲返回亳了。经过李觏的解释,太甲就由孟子言下的悔过之君变成大孝子了,从而否定了伊尹放君之事。事实上,不论孟子抑或李觏的解释,都是观念先行的表现。孟子认为,君不君则臣不臣,君待臣以何种礼,臣则事君有何种态度,礼是君臣互动而非单向的绝对服从。依照这个观念,伊尹流放太甲自然就没什么道德阻力而为理所当然的了。而李觏的批判同样基于一个观念,即君不可废。君是至高无上的,即便犯错,臣子也无权废除流放,因此他下面的解释也就从这个观念出发演绎出来的。他并没有在历史事实层面找出证据来进行强有力的反驳,而只是以观念对观念,因此也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李觏的理解实际上是源于他对君臣之礼的维护和对孔子礼学名教的尊崇。

孟子被视为孔子之道的继承者,自韩愈即有此论,并言“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死后道无传承。这个“道统说”在宋初不仅广为流传,更有人在孟子之后增添数名大儒,以示汉唐并非架漏而过。如孙复便说:“自夫子歿,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2]继承孔子之道者,不唯孟子,更有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后来程颐把董仲舒、毛萼也算了进来。^[3]这个完整的道学谱系,李觏并不认同。他在《常语》中说: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

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得传?^{[1]512}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至孔子,孔子以后则无传。事实上,李觏一方面继承韩愈道统说的前半部分,而另一方面否认孟子继承孔子之道,直接说“孔子死不得其传”,如此一来,荀子、董仲舒、韩愈等人更是不在道统之内了。李觏这里仍遵循周孔并称的传统,因此他就对孔子的理解也就偏于礼教名分等外王学方面。既然孟子偏离了孔子之道,那么借孔子的思想来批判、纠正孟子思想就成为李觏非孟理论的内在要求。

二

在李觏看来,孔子的理论是评定一切后世儒家学者思想正确与否的衡准。孟子不能接续孔子之道,就在于他偏离了孔子的思想。这种偏离具体表现在不尊周、无君臣之礼、王霸之辨、过度诠释经典等方面。

(一)孟子不尊周,偏离了孔子之道

孔子一向以尊周为志:“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能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而孟子却不尊周,违背了孔子之道: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1]512}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之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谏,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1]346}

首先,孔子极力称赞桓公、管仲,而孟子非之;五霸“率诸侯事天子”,而孟子却劝诸侯行仁政而王天下,明显“视周室如无有也”。李觏认为孔子赞赏霸道是为了尊周,孟子行王道反对霸道,是不尊周,违背了孔子之道。

其次,齐宣王问起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情,孟子回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李觏认为《春秋》《诗经》《论语》等孔子亲自修、删、言

的经典都有桓文之事记载,孟子不道桓文之事,则不是孔子之徒明矣。

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尊周的最好办法就是诸侯称霸,尊王攘夷,奉周天子为天下主。因此孔子很赞赏齐桓、晋文之事,并多次称赞管仲佐霸之功。这种情势,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就发生了变化了。其时,群雄并起,互相争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最受苦的总是平民百姓,“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此时周天子的权威已经衰微至极,不光是孟子“视周室如无有”,整个天下都是如此。周王室再也无力挽救天下危机,救民于水火之中。孟子从民本主义出发,把自己的治世理想寄托在那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如齐宣、梁惠身上,希望他们能行王道,一天下而安百姓,解民于倒悬,苏民于乏困。因此,是孟子的济世情怀迫使他是不尊周。

李觏是一个务实的经世致用者。他之所以反对孟子的不尊周,完全在于他的礼学思想。礼学首先就是要正名分。孟子时代的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到了宋代便不存在了,而转变成成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因此,李觏对孟子的不尊周的批判,还要继续深入到君臣关系之间。

(二)孟子无君臣之礼,偏离了孔子之道

在论述君臣之道方面,孟子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一方面,孟子主张君对臣要礼貌待之,不能当作犬马使之。而国君如想有一番作为的话,必须亲自去拜访,不能召见。“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另一方面,孟子认为臣对君并不是绝对地服从。臣对君可以藐视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臣对君可以轻贱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臣对君可以废立、逃避之: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臣对君甚至可以诛杀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的这些扬臣抑君的思想,在宋代引起很大震动。

赵宋之前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君臣大义废弃,伦理纲常沦丧。宋初统治者鉴于此点,大力推崇儒学,亟欲建立一个君臣有等、上

下有序的礼教社会。李觏的《礼论》即是对此的积极回应。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礼学思想,通过探索“礼”的产生、实质、范围、作用等,从而实现推本见末、循名责实、经世致用的目的。礼表现在“定君臣,别男女,序长幼”^{[1]10}的差等之中。“李觏的‘礼论’,从各方面具体说明了‘礼’的等级性、差别性,这便是其‘礼论’的实质所在。”^[4]因此,对于礼学推崇备至的李觏,首先要正的就是君臣大义。而其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孟子扬臣抑君思想的冲击。他对孟子的目无君上的思想甚为愤慨:

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1]512}

孟子违背了孔子“君君臣臣”的大义,虽然与孙子、吴起、苏秦、张仪这些尚诈谋、乱天下的行为有所不同,但是其带来的危害却是一样的。其实孟子认为的礼与李觏所认为的礼有所不同。孟子的礼是双方互动的,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所谓“礼尚往来”之意也。孟子所言臣对君的废立、诛杀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推致其极的选择论,它根源于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于这种两难的选择,李觏则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认为周王室不会坏到如桀纣一样的地步,尚有挽救的余地:

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1]517}

李觏认为,王朝有盛有衰,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国君有明有昏,没有哪个王朝没有昏君,这是必然之理。不能因为一个王朝衰落,就要推翻它;不能因为国君昏乱,就要废黜他。周王室虽然衰败,但是还没有昏乱到桀纣那样的程度,所以还有挽救的余地。但是孟子不但自己不事周,还到处宣扬“地方百里而王”,大至齐梁、小到宋滕,无一例外地劝他们行仁政而王天下,使诸侯常怀不臣之心。孟子自以为是好仁义的,其行动却处处不仁不义。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孔子尊周之道,更是无君臣

之义,李觏因此大为不满。因此,下面他便从对孟子王霸说的批判中,借助孔子的“正名”思想,来确定君臣名分。

(三)孟子的王霸说偏离了孔子之道

王霸之辨首先是由孟子提出来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区别王霸的标准在于民心是否“诚服”。民心如果是被迫服从的,就算主宰天下也只是霸道,齐桓、晋文是也;民心如果如“大旱之望云霓”、婴儿之望父母,即使占据很小的地方也是王道,商汤、文王是也。李觏对此不以为然,他从对王霸正名开始,对孟子的王霸说进行驳斥:

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帝亦称皇,《书》曰“皇帝清问下民”是也。王亦称帝,《易》曰“帝乙归妹”是也。如其优劣之云,则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1]372}

上面一段引文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李觏区分了孟子所说的“王霸”与后世的不同,孟子所说的“王”相当于后世的皇帝。这一区分便显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即通过对孟子王霸之辨的驳斥,来确立宋代的纲常名教。其次,李觏认为王与霸代表的是身份,只有天子才能称王,只有诸侯才能称霸,这种身份不可移易。这是李觏尊崇孔子正名思想的体现。再次,王霸有粹驳之分。有王而粹者,有王而驳者;有霸而粹者,有霸而驳者。“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伯者也。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者也。”^{[1]373}王与霸是名分,不能更改,就算诸侯行仁政也只是霸道,算不得王道。

可以看出,李觏把王霸之辨的标准转移到万古不变的名分礼教上,改变了孟子以来的以是否“以德行仁”、民心是否“诚服”为王霸标准的格局。这样,李觏就达到了以孔子正名思想来批判孟子无君臣之义的目的。

(四) 孟子过度诠释经典,偏离了孔子之道

李觏并不满足于上面几点对于孟子的批判,而继续深入下去:既然孟子自认为是私淑孔子的学说,为什么却又与孔子之道不同呢?李觏发现,这都源于孟子对经书的过度诠释,从而失去了孔子的真实本意。

从历史上看,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治学方法对于宋初学者突破章句训诂、打破经典权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宋初学者逐渐抛弃了汉唐注疏之学,开始对儒家经典进行质疑,如欧阳修、王安石等对六经及《中庸》的存疑。孟子的这一观念,“对于渴望扫除汉唐经学弊端的宋代儒家学者,其作用尤为巨大,使他们更有了改变笃守家法师法的学风和破除迷信经典权威的勇气,培养了他们可贵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孟子大胆疑《书》的态度,无疑为宋人疑传、疑经开了先河。”^[5]但是就在这种疑经、疑传蔚然成风,甚至有些近于浮躁之时,李觏却给时人注射了一针清醒剂: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甚哉!世人之尚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讙讙,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1]514}

李觏认为,六经皆是经过孔子删定的,是不可移易的经典。现在人们却拿孟子的一句话来判断六经之非,实在是错误之极!就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而相信外人一样。孟子对经典怀疑,就等于自绝于孔子之道,焉能续道统?这样,李觏便找到了孟子违背孔子之道的根源所在了。

由尊孔子之礼教到反对疑经疑传,这充分显示了李觏传统保守的一面。面对时人盲目尊孟,李觏痛心疾首,他在《常语》结尾中说道:“呜呼!今之

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1]518}这也道明了“常语”之“常”的含义,即孔子之名教!

三

不仅在外王方面,李觏也在内圣方面对孟子性善学说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孟子对人性的认识并不全面,性善论有缺陷,不能全面地说明人性问题。他尤其反对孟子“仁义礼智,人皆有之”的人性论观点,而认为这种德行只有圣人才天生具有,其他人则需要后天的学习:

圣人者,根诸性者也。贤人者,学礼而后能者也。圣人率其仁、义、智、信之性,会而成礼,礼成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矣。仁义智信者,圣人之性也。贤人者,知乎仁义智信之美而学礼以求之者也。礼得而后仁义智信亦可见矣,圣与贤,其终一也,始之所以异,性与学之谓也。^{[1]11}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这里李觏则换成了“仁义智信”,把这四种德作为人性的根本,礼则是作为人性的外在的表现。圣人是生而具有“性”并通过礼表现出来。而贤人则是根据外在的礼反求内在的“性”,是“学礼而后能者”。圣人只是“性”与“学”之异,开始虽有不同,“及其成功一也”。

李觏吸收了韩愈的“性三品说”,并发展成为人性“三品五类说”:

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学而自能者也,圣人也。下愚,虽学不能者也,具人之体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为三焉:学而得其本者为贤人,与上智同;学而失其本者,为迷惑,守于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学者为固陋,与下愚同,是则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1]12}

人性有三品:上智、中人、下愚,这是继承韩愈而来的。与韩愈不同的是,李觏又将“中人”之性分为三种:贤人、迷惑、固陋。这三者的区别在于学的程度,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改变。通过学习而能够得到仁义智信之性的,可以为贤人,和上智相当;虽然学习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仁义智信之性的,只能

成为中人;但是不学习的,就和下愚不移之性差不了多少了。可以看出,李觏取本于孔子的思想:“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李觏认为现实人性的复杂,并非孟子所谓的人先天性善能说清楚的。孟子所说的性善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不符合人性本然,失之片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觏虽然在以上各个方面对孟子学说提出质疑,但他并非完全否定孟子。《太史杨升菴集·卷四十八》云:

泰伯未尝不喜孟子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名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引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潜书》引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广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省欲》论引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本仁》论引以至仁伐至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轲并称。《送严介序》称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礼貌之。《常语》引孟子俭于百里之制,又详说之。由是言之,泰伯盖深于孟子者也。古诗《示儿》云:“退当事奇伟,夙驾追雄轲”,则尊之亦至矣。^{[1]519}

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也说:

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仅《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詭詭也。然詭詭者,岂知二子之尊孟轲处,《常语》亦尊之矣。?……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孰为究明?^[6]

李觏深于孟子之学,议论多引用其说,或驳斥,或赞同,不一而足。可见李觏并非不知孟子而无所放矢,他只是指出孟子违背孔子之说的地方,成为宋人一味尊孟中的“逆流”。

关于李觏的非孟思想,我们可以结合时代与思想背景,把握其特征与贡献。首先,从政治上看,孟

子的君臣观危及新造之宋。孟子不尊周、无君臣之礼,和宋初统治者提倡儒学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而孔子的“君君臣臣”的礼教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李觏出于维护正统的君臣大义思想,对当时出现的尊孟现象表示异议。于是借孔批孟,也就自然成理了。其次,李觏对孟子违背孔子之道的批判是逐步深入的。首先从孟子不尊周开始批判,进而深入到君臣之礼,继而通过对孟子王霸说的批判来阐释正名思想,最后终于找到孟子不合于孔子之道的根源——孟子对经书之意的过度诠释。对孔子之道是完全遵从还是“以意逆志”式继承,这是李觏和孟子的差别所在。再次,李觏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他非孟论辩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李觏坚持的是君本主义,在礼教名号上尊崇王道,在治理国家上施行霸道、富国强兵。这和孟子所坚持的民本主义、重王贱霸等思想相抵牾,因此李觏要阐明他的思想,就有必要对孟子学说进行批判性审视。应该说,在一片尊孟潮流中,李觏能够对孟子学说进行历史性、学术性的理性考量,诚是难得。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宋代孟子学的开展,探讨孟学诠释史的时代特征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觏集[M]. 王国轩,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孙复. 孙明复小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172.
- [3] 程颢,程颐. 二程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4:314.
- [4] 姜国柱. 李觏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7.
- [5] 周淑萍. 两宋孟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8.
- [6]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101.

责任编辑:骆晓会